

野田内阁面临的挑战与抉择

编者按：2011年9月2日，野田佳彦内阁诞生于东日本大地震后内外纷扰此伏彼起的“多难之秋”。在经历了2012年1月13日的内阁改组后，仍面临诸多难题。为此，2012年1月，本刊特约李薇等七位在京日本研究学者就野田内阁所面临的挑战及其采取的对策撰稿如下，以飨读者。

李薇：2012年野田政权面临的挑战

2011年，日本经历了令世界震惊的东日本大地震及其引发的大海啸、核泄漏等三重灾害，这对于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面临严重结构性问题的日本来说，可谓雪上加霜。2012年，日本民主党野田政权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主要可分为关系国家发展的长期性结构问题、灾后重建以及落实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问题、对华关系问题等。

（一）在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野田政权面临着人口结构、财政结构和政治结构等长期性问题的挑战

制约日本经济社会下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是人口结构问题。目前日本的人口总数为1.2806亿，按照1.35的生育率计算，2060年日本的人口总数将下降到8674万，其中15~64岁的人口将在50年后减半；目前，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已经达到23%，劳动人口与65岁以上老年人口之比为2.8:1，2060年这一比率将下降到1.3:1。^①另有研究表明，日本的劳动人口以每年1%的速度减少，对经济增长产生0.7%的负面影响，与0.7%的年生产率增长相抵。^②这意味着中产阶级的人数将逐步减少，日本大多数年轻人很难比自己的父辈生活得更轻

① 「50年後の人口3割減少 人口問題研の推計」、『朝日新聞』2012年1月31日。

② 『金融財政事情』2010年9月6日号、10頁。

松、更富有。^①而且，日本已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人口红利”时代进入经济成熟期的“人口重担”时代，人口的减少和结构变化导致其消费需求下降。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 2012 年 1 月 10 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时指出“日本经济自 2000 年以来低速爬行，其主要原因是出现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快速老龄化和人口减少。”^②劳动人口的减少，使日本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4% 降至 21 世纪头十年的 1% 左右。^③如果日本的人口结构不变，这种趋势将持续下去。

制约日本财政能力的主要障碍，是不断恶化的财政结构问题。与人口结构问题相关，日本的社保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而且社保支出额也正以每年 1 万亿日元的幅度继续增长，愈发加重日本政府的财政负担。^④日本的公共债务（包括国债、借款和短期政府债券）余额在 2010 年底为 919.15 万亿日元^⑤，2011 年底已增至 985.36 万亿日元，而且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 2012 年度预算草案，2012 年日本政府将新发 44.2 万亿日元国债和 2.7 万亿日元“复兴债”，这意味着到 2012 年底日本的公共债务余额将突破 1000 万亿日元。^⑥尽管日本国债的 95% 为本国债权人持有，暂时不会发生国际信用危机，但这同时意味着巨额资金从私营部门流向了投资回报几乎为零、债权收益极少的公共部门，随着公共债务余额逐渐接近国民储蓄余额（1400 万亿日元），日本国家信用的限度也将临近。

制约日本探索新型社会模式的主要障碍是政治结构问题。在日本，政党政治远离民主政治的初衷，越来越以维持政权为最高政治目标，更加利用舆论和为舆论所用。形成这种政治结构的原因有二：（1）冷战

① 白波瀬佐和子「先進国で中間層の縮小が同時進行 問われる成熟社会のあり方」、『エコノミスト』2012 年 1 月 31 日号。

② 白川方明「デレバレッジと経済成長 先進国は日本が過去に歩んだ『長く曲がりくねった道』を辿っていくのか?」、http://www.boj.or.jp/announcements/press/koen_2012/data/ko120111a.pdf、7 頁。

③ 参见日本《东洋经济统计月报》2010 年 1 月刊登的日本生命基础研究所经济调查部长栞浩一《2010 年日本经济展望》。

④ 『日本経済新聞』2010 年 7 月 1 日。

⑤ 財務省「国債及び借入金並びに政府保証債務現在高」、2011 年 2 月 10 日、<http://www.mof.go.jp/jgbs/reference/gbb/index.htm>。

⑥ 「国の借金最大 1085 兆円 12 年度末」、『日本経済新聞』2012 年 1 月 25 日。

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行业协会、工会等政治势力趋于弱化，朝野同归保守；（2）小选举区制度导致候选人对舆论造势的严重依赖。要解决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口结构、财政结构等重大问题，需要日本政府提出一个共渡难关、共担痛苦的具体蓝图，但是在目前这种政党政治结构下，任何忍痛性质的改革方策都会置政权本身于危险之中。

（二）野田政权在 2012 年所面临的重大国内挑战，是提高消费税率的相关法案能否在国会通过。该法案关系到落实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的推进，也关系到不断恶化的财政困境的缓解

因地震、海啸、核泄漏的发生，日本政府在 2010 年制定的 2010 ~ 2020 年《新经济增长战略》和《为实现新增长战略的三段式经济对策》尚未实施，就被 2011 年 6 月出台的《复兴基本法》所取代。根据《复兴基本法》，日本采取了设立复兴厅等专职机构、建立复兴特区、发行“震灾特别国债”、设立“复旧复兴财政转移支付”、减免灾区的个人所得税和法人税等措施，并为救灾推出了四次补充预算案。这些救灾政策的实施，对日本政府的财政来说是不小的负担，而且 2011 年日本的经济状况并不乐观。根据日本银行的预测，受国内外灾害、日元升值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2011 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为 -0.4% 。^① 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数据，2011 年日本贸易收支出现 2.4927 万亿日元的赤字，为 31 年来的首次。^② 此外，由于相对较高的工资成本和法人税率以及日元升值、电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作用，日本制造业向海外转移的趋势不可遏止，更增加了日本国内对产业空洞化的担忧。

为了减轻财政负担，日本政府急于推动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方案的落实。按照设想，首先是在 2012 年例行国会上通过提高消费税率的相关法案，其次是在提高消费税率的基础上，以适度合理、总体抑制社保支出为目的，提出调整社会保障相关规定的法案，并在适当时机提交国会审议。但是，目前看来，第一步已经迈得十分艰难，第二步更未提上日程。自 2010 年以来，消费税问题已成为日本政治斗争的焦点，不仅朝野政党之间存在分歧，民主党内部也因此分裂为两派。2012 年，

① 「国内景気回復に遅れ」、『日本経済新聞』2012 年 1 月 25 日。

② 「貿易赤字 31 年ぶり」、『日本経済新聞』2012 年 1 月 26 日。

在野党和民主党内部的反对派更是把反对提高消费税率作为与现政权进行政治博弈的良机。如果野田政权与各方协调失败，日本将面临众议院提前选举、政党之间以及民主党党内的势力对比重新洗牌的局面。

如果野田首相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民主党政权将面临关系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自 2009 年政权更迭以来，民主党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各项保证逐一破产，日本民众对菅直人内阁在东日本大地震救灾中的表现十分不满，2011 年 9 月野田佳彦的上台也没能提振民众的信任，尽管野田内阁在外交和安全领域表现积极，但其支持率没有明显上升。因此，可以说，民主党既缺乏政治领导人的个人魅力，也缺少执政业绩的积累，并没有多少资本在大选中一搏。而野田本人在 2012 年 9 月民主党的定期党首选举中能否取胜，也将取决于国会是否批准提高消费税率的相关法案，或取决于众议院大选的结果。

在国政失意的背景下，新兴地方性政治组织的动向也将成为对民主党野田政权的一个挑战。2011 年 11 月，“大阪维新会”在市长选举和知事选举中大获全胜，让各大政党看到了地方领导人利用民意和地方议会探求区域性发展路径的意志，也标志着日本传统政党政治影响力的下降。人们不仅注意到各大政党在大阪地方选举中的惨败，也不得不承认大众对中央政府的失望会给新兴势力或极端主义带来政治空间。与现阶段的其他政党一样，“大阪维新会”没有提出明确的国家发展目标，与民主党上台时的理想化口号相比，其论调同样具有冲击力和煽动性，但同时也显示出昭示地方议会存在感和强化地方议会权限的强烈愿望。“大阪维新会”在大阪地方选举中胜出，证明了选民对民主党、自民党等主要政党的失望。除了大阪地区之外，东京都、爱知县的地方领导人也在为下次众议院大选做准备，野田政权以及民主党将面临更加复杂的政治重组局面。

（三）在外交方面，野田政权面临其战略选择与国家定位之间存在矛盾的挑战

首先，日本的傍美战略与其国家目标之间存在定位矛盾。

尽管多年前日本政治家提出的“政治大国”、“正常国家”的国家定位已很少被提及，但日本利用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机会继续谋求实现上述目标的意图仍旧可见。野田佳彦在《我的政治哲学》中明确指出：

“我们要下定决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坚决坚持日美同盟。”从这个表述中可见其政治传承与抱负，实现“正常国家”仍是日本的国家目标。在谈到外交定位时，野田称“日本外交的‘主轴’毫无疑问是日美关系。在明确这一点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日本的外交。”^①可以看出，“傍美”是日本根据力量对比做出的选择，利用日美同盟关系发展自己是日本战略手段。日本谋求的“正常国家”目标与其战略选择和客观条件间存在着矛盾，集中体现为如何处理美国对日本的直接或间接的控制。野田政权同样面临日本政治传承下来的挑战，即如何处理政治抱负与傍美战略之间的矛盾。美国的财政状况恶化，赋予了同盟伙伴日本更多的责任，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可以预见，日本会在美国的默许下进一步将“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特例扩大化，并对宪法第九条做出更具弹性的解释，不仅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铺平道路，也为日本获得更多的军事自主性创造条件。

美国的战略重心东移提升了日本战略存在感，野田政权的外交安全走向较其前任更加明确。日本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作为自己的战略机遇，利用其头号盟国的特殊身份，积极介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行动，充分发挥其作为战略支撑点的作用。日本还参与在南海的对华制衡，并为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国利益造势，强化西南防务部署以及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据悉，野田首相还将提出名为“太平洋宪章”的新外交战略，意在模仿当年的《大西洋宪章》，“在亚太构建关于经济合作和解决冲突的全面原则”。^②这与来自美国政治精英的同一倡议相吻合。^③对于美国方面来说，日本是其实现亚太军事战略的最重要的支撑点^④，容不得日本方面出现任何的动摇，因而对日本的控制没有任何放松。2011年，美国已经通过高调宣示战略重心东移和遏制中国“扩张”

① 野田佳彦「私の政治哲学」、『Voice』2011年10月号。

② 「首相 太平洋憲章提唱へ 日米軸に中露取り込み」、『産経新聞』2012年1月18日。

③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2011年11月25日发表美国外交学会国际机构与全球治理项目主任斯图尔特·M·帕特里克撰写的文章《奥巴马谋划美国太平洋世纪》。文章指出，希拉里所构想的“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不会在一夜之间实现。不过，这不会阻止奥巴马政府清楚地阐明美国的原则。这些原则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新的《太平洋宪章》。

④ 约瑟夫·奈在2012年1月23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称，“日本在美国的东亚政策上处于中心性存在，这一点已经被奥巴马政府所明确”。参见：ジョセフ・ナイ氏「空・海での日米協力重要」、『日本経済新聞』2012年1月23日。

稳住了日本这个首要盟友，又通过大地震后的“朋友作战”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政治认同，还通过日美“2+2”会谈进一步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和区域安全作用。但是，美国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调整并非专为日本的需要而设计，因此必然牵动着日本敏感的神经。

其次，日本的“傍美”战略与其意图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安身立命的目标相矛盾。

日本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每隔几年就会出台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结果积累起更多的债务，经济增长却依然疲软。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日本经济曾经出现的几次温和复苏都是由外需拉动的，特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日本极度希望从国外特别是从中国获得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是其进行投资和贸易最关注的目标市场。

日本一方面想抓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机会，另一方面又要参与制约中国的战略之中。日本外相等政治家先后在最近的讲话中提到建立日美中三边对话机制的设想，目的就是同中国一道在亚太建立一个“开放和多层的网络”，从而使地区的增长机会最大化。^① 不排除这个建议既隐含着将中国限定在一个行动范围内的意图，也带有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愿望。日本把日美同盟视为其应对中国的护身武器，把中国市场看做其实现成长的养料，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关系、在这两个大国之间找准自己的位置，是日本的大事。但是，以日美同盟为前提的三边关系框架是不可能建立的，因为中、美、日三边关系不可能等同于中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日本的安全战略选择与谋求在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愿望之间存在严重不平衡。

作为位于中国周边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岛国，近代以来日本往往是通过对中国理解来完成对自身的理解和定位。今天，当中国快速崛起的时候，日本又面临如何看待中国、如何给自己定位的历史时刻。日本战略思维深受“中国威胁论”和权力制衡论的影响，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发展，甚至对中国科技所取得的一点进步都会感到不安。可以认为，日本在亚太地缘政治中对中国的政治认同是影响其战略选择的主要因素，心理认同越差，战略防范越深。此外，美国在

^① 参见《参考消息》2012 年 1 月 26 日。

冲绳驻军问题上的任何调整，也同样会快速挑动日本紧张的神经。野田政权在短期内难以摆正三边关系，日本在对华、对美外交上仍将继续面对挑战。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刘江永：把脉野田内阁执政前景

2012 年是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的选举年。日本民主党、自民党也将于今年 9 月举行领导人选举，迎来多事之秋。近年来，日本首相易人频繁，国内外政策摇摆幅度较大。新年伊始，以大阪市长桥下彻为首的“大阪维新会”异军突起，而野田佳彦内阁支持率则连续下跌，其执政前景引人关注。

（一）人气下滑的野田内阁尚可维持

2011 年 8 月 30 日，野田佳彦在众参两院举行的提名选举中当选日本第 95 任、第 62 位首相。野田内阁执政不到半年，支持率明显下滑。据日本共同社 2012 年 2 月 18、19 日全国电话舆论调查显示：野田内阁支持率从上任之初的约 60% 降到 29%，较 1 月调查时又下跌 6.8%，首次跌破 30%；不支持率则上升 4.7%，升至 55.2%。造成野田内阁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日本国内就是否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争论激烈。2011 年，野田首相表示参与 TPP 谈判后，反对之声一片，党内反对派十人退党。

其次，围绕是否增加消费税意见分歧严重。共同社 2012 年 1 月民调显示，反对野田内阁提高消费税方案者占 52.9%，支持者为 45.6%。2 月 17 日，野田内阁通过《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在提高消费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继承税的同时，在养老金、医疗等方面照顾弱势群体。对此，共同社民调显示，支持者占 48.3%，反对者占 50.6%，两者距离略有缩小。

再次，个别内阁成员发言不当，影响了野田内阁形象。野田首相为改善形象，于 2012 年 1 月 13 日改组内阁，并提出 2012 年施政方针，即继续全力以赴地实现地震灾后重建、平息核电站事故及重振日本经

济；切实实行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推进“开拓亚太时代外交”；抑制日元升值，加速实现新经济增长战略。

尽管如此，野田内阁近期仍可维持执政地位。目前，日本国民心态变得很纠结，既对野田内阁不满，又不愿看到内阁频繁更替。2011 年底《朝日新闻》民调显示：71% 的受访者对民主党政权处理核事故和灾后重建不满，但 80% 的受访者也不看好自民党。而大阪市市长桥下彻率领的“大阪维新会”则提出所谓“船中八策”^①，名声大噪。共同社 2012 年 2 月民调显示，希望“大阪维新会”参与国政者达 61.2%。

桥下立场偏右，其影响力如日中天。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正企图借机推动地方右翼大联合，夺取中央政权。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也不甘寂寞，组建了“减税日本党”并谋求与桥下彻联手。2012 年 2 月，河村隆之在南京访日代表团面前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是经过计算的。其目的之一是迎合日本右翼民族主义思潮，提高“知名度”，扩大国内政治影响，与石原慎太郎遥相呼应，为右翼势力赢得未来大选搞投机。但适得其反，桥下则与河村保持距离，在反对增加消费税问题上支持小泽一郎。

这股“桥下旋风”使民主党危机感骤然上升，担心现在举行大选，桥下彻率领的“第三极”将击败民主党和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他们意识到，野田内阁和民主党要继续执政，就要避免在目前不利情况下提前举行大选。对于河村隆之的错误言论，野田首相也避免表态，以免引火烧身。

（二）野田政权与日本政局前景

日本政局前景难测，根据目前情况判断，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前景。

1. 野田长期执政

2012 年 9 月民主党代表选举，如果野田佳彦能连选连任，他将继续作为民主党领导人担任首相。继而，如果野田佳彦能率领民主党赢得 2013 年 7 月参议院选举和同年 9 月的众议院选举，就可能在 2014 年 9

^① 桥下彻提出的所谓“船中八策”包括：日本中央与地方统治机构改革、行政改革、公务员制度、教育改革、社会保障、经济——就业——税制、外交防卫、修改宪法等八个方面的政策主张。在外交防卫方面，他主张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加强日美澳战略军事部署；在修改宪法问题上主张把国会三分之二赞成的必要条件放宽为二分之一，并在两年后举行全民投票。

月再度当选民主党代表，从而成为继小泉纯一郎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目前在日本一般认为这种可能性较小。

2. 野田内阁相对短命，而民主党可持续执政

2012年1月，野田改组内阁，邀请该党前干事长冈田克也出任副首相，以利推进增税路线，提振内阁人气。同时，起用田中直纪担任防务大臣，以安抚党内小泽派。但是，如果民意支持率持续大幅下滑，民主党内矛盾加剧，导致野田在9月民主党代表选举中落选，那么，民主党便可能推出新的首相候选人，努力争取在2013年参众两院选举中获胜。届时，不排除参众两院同时选举的可能。在大选前，民主党将继续执政。

3. 野田内阁短命，民主党下野

如果2012年6月下旬野田内阁向国会提交消费税增税法案受阻，导致解散众议院，提前大选，民主党胜算很小。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曾为通过邮政改革法案而解散众议院并获胜，但野田主张增加消费税则很难获得选票。然而，即便野田不愿铤而走险，自民党仍可能在2012年内对野田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一旦通过，势将导致提前进行大选。民主党若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利，无疑将沦为在野党并可能彻底分裂，而取而代之的可能是经过分化组合的新政党或多党联合体。

4. 未来大选前后，日本政坛出现新的分化组合，可能形成“三极鼎立”

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已开始利用民众对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失望而加紧集结，地方势力高调凸起。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企图支持小党“奋起日本”的代表平沼赳夫出面，联合大阪市长桥下彻、国民新党前代表龟井静香等人组建新党。石原和桥下作为东京都和大阪市的行政首长，在2011年底《朝日新闻》有关“谁最适合当首相”的民调中，竟然分别排在第一、第二位，人气正旺。但是，目前桥下对石原态度冷淡，他领导的“大阪维新会”正摸索与横滨市市长中田宏、爱知县知事大村秀章合作，与公明党、大家之党联手，企图在未来的大选中一举拿下众议院200议席。今后桥下彻无论与哪一股势力结盟，都有可能形成与民主党、自民党鼎立的“第三极”，甚至可能坐收两大保守政党相争之利。

(三) 未来选举的焦点与看点

未来两年，影响日本选举的重要因素将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以国内因素为主，两种因素可能围绕以下六个问题，彼此交织，相互作用。

1. 日本是否增加消费税

野田执政后既不会轻易放弃政权，又想在位时做成一两件大事。力排众议，增加消费税就是野田心中的一件大事。其目标是，2012 年 3 月末向国会提交增税法案，争取在 6 月 21 日例行国会结束前通过，把目前 5% 的日本消费税在 2014 年提高到 8%，2015 年提高到 10%。为此，野田内阁表示，增税将专门用于社会福利，而非用于防卫费和公共开支，甚至表示同意减少国会议员数量及公务员两年内减薪 7.8%，以缓和党内外反对意见。尽管如此，增税路线仍不会一帆风顺。而一旦这一关闯过去，对野田 9 月连任将起到关键作用。

2. 日本未来是否继续保留原有核电站

在 2011 年 4 月地方选举中，打着反核电旗号的候选人高票当选。日本原计划在 2030 年之前新建 14 座核电站计划现已搁浅。目前，日本 54 座核电站只有 4 座运转，2012 年夏季将全部停止运转。但是，未来如何确保电力供应和经济增长，如何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减排指标等问题，也将令日本进退两难。福岛核事故后遗症在野田任内不可能彻底解决。如何对待核电站仍将是日本选民持续关注的一大问题。

3. 野田内阁成员是否会有丑闻曝光

民主党前代表小泽一郎因涉嫌 4 亿日元土地交易的政治资金丑闻而受到追究，但目前被检方认定证据不足。前首相菅直人曾涉嫌接受外国人政治捐款行为，前原诚司甚至因此而辞去外相职务。2011 年 10 月，经调查发现，有两名旅日外国人使用日本人姓名，自 2000 年至 2006 年向野田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提供了 47.1 万日元（约合 6038 美元）政治资金。事发后，野田立即全额退还，此事不了了之。今后，一旦野田再有重大丑闻曝光并得到证实，日本政局就可能发生雪崩似的突变。

4. 日本是否加入 TPP

野田等人主张参与 TPP 谈判，日本社会舆论和民主党内意见不一，在野党借题发挥，从旁牵制。日本经济产业省、经济团体联合会及部分舆论支持参与 TPP，而农林水产省和地方农协组织等反对。外务省从战

略上考虑，支持参与谈判，以维持日美关系。参与 TPP 的关键是，日本能否按美国的要求和规则开放市场，实现日美贸易自由化。澳大利亚等国也会趁机要求日本开放农业市场。这在核事故重创日本农牧业的情况下，势必引起国内更强烈的抵制。野田首相对此心知肚明。他表示，参与谈判主要是为安抚美国。然而，问题在于，日本的 TPP 支持者大多高高在上，而反对势力则扎根于“草根”，善搞“群众运动”，对选举时地方选情的影响不容忽视。同时，日本 TPP 的反对势力又与反对提高消费税的势力迅速靠拢，其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大。

5. 美军冲绳基地搬迁问题

美国同意从冲绳撤出 8000 名海军陆战队，以此为让步，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把冲绳普天间基地转移到名护市的边野古地区。然而，冲绳民众和地方政府则继续反对美军基地搬迁到冲绳的其他地方。2012 年初，防务大臣田中直纪与冲绳知事仲井真弘多会谈未果。民主党 2009 年众议院选举时曾表示支持冲绳的主张，执政后却在和美国和国内传统势力压力下重回自民党执政时期政策。上述矛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未来大选尚待观察。

6. 如何处理中日之间的敏感问题

2012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也是“中日国民友好交流年”。野田首相 2011 年末访华，意在推动两国关系。然而，2012 年伊始，日本个别议员擅自非法登岛，继而日本政府给无名岛命名时又把钓鱼岛附属岛屿包括在内，引起中方严正交涉。2012 年 9 月日本民主党代表选举时，日本右翼势力很可能利用所谓钓鱼岛事件两周年之际搞反华游行，甚至在钓鱼岛问题和历史问题上再度制造事端。这有可能使野田内阁面临国内外压力，处理不当不仅会损害中日关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各项选举结果。

(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高洪：东日本大地震后民主党在核泄漏灾区的势力消长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猝不及防的海啸灾难与前所未有的核泄漏事故给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弥漫在整个社会

的核泄漏灾难的负面影响至今难以消散。在政治领域中，政府的核泄漏事故应对、善后处理、损害赔偿等，无一不是国会的中心议题。然而，对执政党而言，灾后选民的政治抉择，则意味着党的执政能力行情的涨落。震后八个月，在核泄漏重灾区的福岛县举行的县会议员选举，恰恰是反映人心向背和民主党在灾区势力消长的一块试金石。

（一）灾区选举中进退维谷的民主党候选人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建设与纵向权力结构的稳固性是影响该政党所处的政治生态环境的两个重要因素。随着核泄漏事故不断出现新的情况并引起全社会的一次次关注，核泄漏重灾区的党派力量消长也随之“放大”到国政层面，日本民主党在政治敏感地区福岛县的议会选举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大地震发生前，民主党在福岛县的基础不可谓不扎实。以日本选举政治中的所谓“势力地盘”、“政治招牌”和“财力皮包”观察，该县在日本政治地图中本来就近民主党而远自民党，且曾经多年由亲民主党知事主政，议会中约占半数席位也掌控在民主党手中。作为政治招牌，民主党显然较自民党等反对党光鲜——现任野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玄叶光一郎外务大臣就出自福岛选区，风头正劲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们一面秣马厉兵准备参选，一面通过开办形形色色的“塾”和讲座宣传松下政经塾理念，无疑也有给民主党造势的连续作用。在政治资金方面，民主党划拨给福岛县候选人的资金也比较充足。倘若没有东日本大地震，民主党候选人在福岛取得一定程度上的胜利当无大的悬念，甚至有人乐观地判断：福岛俨然是一座民主党政府的“牙城”^①。

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民主党在福岛县议会选举中的候选人处境尴尬，整个选举过程一直纠结在政治理念与选民诉求的多种矛盾当中。

1. 民主党候选人无法处理党的执政方针与灾区民意的矛盾

骤降的核泄漏灾难，使此前准备的所有选举纲领处于次要地位，灾后的选民对各党派推举的候选人大多只有一个焦灼的诘问“在你的选举纲领中是否放弃核电产业？”其实，选民期待的答案与选票流向的关

^① “牙城”指古代军营中主将居住的内衙的卫城建筑，即主将的拱卫工事。古语中“牙”通“衙”字，日文中至今仍沿用古汉语里“牙城”的表述。

系简单明了，在野党和无所属候选人只要回答“废弃核电产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赢得选民的支持。与竞争对手纷纷争说“弃核”不同的是，当时执掌国家政权的民主党并未下决心轻言“放弃核电战略”。所以，民主党在福岛议会补选中的候选人进退维谷，既不能说“弃核电”，也不能说“搞核电”，处在两难境地。据知情人透露，作为执政党推举的候选人自然不能违逆该党奉行的核电能源战略，如果表态“弃核电”就等于放弃党内配发的高达千万日元的选举资金，选战打响却没有“弹药”，下场不言自明。相反，完全按照民主党继续发展核电战略的口径表态，自然会激怒因核泄漏事故苦不堪言的选民，下场也同样不言自明。百般纠结之后的民主党候选人自己选择了在党与选民尖锐对立的立场间打“擦边球”，提出一个既不明显违背党的纲领，也不与选民正面冲突的选举口号“从核电产业毕业”。^①

2. 如何评价政府的救灾政策的矛盾

与在野党候选人、媒体言论领袖不同，民主党的候选人无法迎合社会舆论去痛批民主党政府救灾不力，或者无所顾忌地批判东电与政府官商勾结。原因在于自己置身执政党一方，但补选却偏偏发生在灾民情绪不稳定的时点上。按照东京都救灾中心编制的《灾民心理救助手册》^②对特大灾难发生后，灾区公众心理变化阶段的划分，在经历灾难发生之初的“茫然麻木期”和短暂的“互助蜜月期”后，灾民会普遍进入一种为时一到两年的“消沉幻灭期”。这一时期灾民的心理特点是：精神上的剧烈短痛转化为“难以消除的长痛”，抗灾时期的顽强意志与相互扶助精神逐渐消磨殆尽。于是，怨天尤人、指责政府、哀叹易怒、自暴自弃等非理性的负面情绪往往上升，并在区域性的大众心理共振中造成较为普遍的心境阴影。在这一背景下，选举中如何评价政府的救灾政策，自然是民主党候选人棘手的两难选择。况且，作为执政党代表的民

^① 核电产业在日文中略称作“原发”，即“原子能发电所”之略。政府的核电政策属于“促原发”，民间弃核电要求简称作“脱原发”，民主党候选人绞尽脑汁想出的擦边球选举纲领称作“卒原发”，即从原发产业中毕业。原创出自民主党福岛县支部长、玄叶光一郎的秘书、松下政经塾16期毕业生大场秀树。

^② 东京都福祉保健局2008年发行版。该手册出自日本医疗系统与心理专家对以往灾后心理救助的经验积累，通过灾民心理辅导的大量临床数据总结而成，有较高的实践验证和大众心理变化规律上的可信性。

主党候选人，在群情激愤的环境里，难免会成为灾民迁怒的对象。

3. 政府外交战略调整与灾区选民间的矛盾

选战大幕拉开之前，民主党政府出于亲美外交战略考量，作出积极参与 TPP 谈判的政治姿态。2011 年 11 月 10 日是福岛议会选举前两周的关键时刻，野田首相宣布日本将参加 TPP 谈判。然而，对在如此社会氛围中迎接选举战的民主党候选人来说，宣布加入 TPP 谈判简直是雪上加霜。福岛县地处日本东北，属于相对落后的农业县。孱弱的日本农业历来依赖贸易保护屏障，所以福岛县农民大多反对政府加入 TPP 谈判，认为核泄漏救灾不力的中央政府却要开放农业，对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中央政府的政治决断，几乎葬送了执政党候选人在地方补选中仅存的希望。

(二) 民主党候选人兵败福岛市选区

上述因素使民主党在福岛县议会选举中的选情急转直下，尤其在福岛县议会选举核心地区的福岛市选区，地震前后民主党候选人的境况从自信满满变为无胜算。2011 年 11 月 23 日，福岛市选民投票选举本选区县会议员。根据福岛县选举管理委员会当晚发表的选举公报，来自民主党、自民党、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以及无党派候选人的 11 名参选人争夺 8 个议席。投票结果是所有在野党候选人全部当选，民主党方面则有两名候选人——高桥秀树和大场秀树落马，特别是有市会议员经历，且以玄叶光一郎秘书头衔参选的大场秀树输得相当惨，只获 6331 张实际得票，还不及原来预期的一半。^① 仅存的民主党候选人石原信四郎也同样遭遇厄运，与四年前以最高得票头名当选时相比，石原信四郎在本次选举中仅得到 8258 张选票，在所有当选者中排名倒数第二。另外，从福岛县议会整体看，自民党推举的 32 名候选人中有 27 人当选，公明党推举的 3 名候选人全部当选，共产党推举的 6 名候选人中有 5 人当选，社民党、大家的党也各有斩获。而民主党推举的 23 名候选人中只有 15 人当选，在福岛县议会中的力量对比关系也从势均力敌转变为民主党的相对弱势。

选战结束后，败选的民主党候选人也开始痛定思痛，思考新的发展

^① 『福島民友』2011 年 11 月 21 日。

路径。其实，较之“时运不佳”，候选人在选举策略上的错误并不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例如，虽然“从核电产业毕业”确有语焉不详之嫌，但究其根本原因仍在于政府的发展核电战略到了核泄漏事故，所以只要站在民主党立场上出马竞选，输掉选举基本上是符合逻辑的结果。

此外，从选举政治学视角分析，核泄漏灾难造成的“异地投票”，以及投票率下滑本身也都不利于民主党。2012年3月12日的《朝日新闻》刊登出政府公告，在大地震一周年公布的死难者数量为15854人，失踪3155人，避难者343935人，其中大部分处在“异地避难”的状态。根据福岛县选举委员会告示，本次县议会补选，因东日本大地震推迟七个月之久。2011年11月23日投票时，由警察将投票箱押运至200公里外的部分移居埼玉县的灾区选民暂住地投票，投票结果得到了移居选民的14467张选票。处在困顿状态的选民在异地投票中自然很难选择执政党，他们的选票本身并不多，但考虑到“异地选民”对家乡父老的影响，就不能不说是民主党的不利因素了。

表1 福岛县议会选举投票率变化表 (%)

次数	1	2	3	4	5	6	7	8	9
年月	1951.4	1955.4	1959.4	1963.4	1967.4	1971.4	1975.4	1979.4	1983.4
男	92.1	86.5	87.8	87.9	84.0	83.9	83.6	79.3	78.6
女	89.1	84.5	84.3	86.5	83.6	85.2	84.7	80.7	80.1
总计	90.5	83.8	85.9	87.0	83.8	84.6	84.2	80.0	79.4
次数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年月	1947.4	1987.4	1991.	1995.4	1999.4	2003.4	2007.4	2011.11	
男	88.1	75.2	73.3	69.1	65.5	57.0	56.5	47.36	
女	84.8	76.8	75.3	71.8	67.3	59.2	57.5	47.64	
总计	86.3	76.0	74.3	70.5	66.4	58.2	57.0	47.51	

资料来源：『福岛民友』2011年11月21日。

再看投票率的总体趋势。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福岛县议会选举投票率相对稳定，呈现缓慢下降趋势，但本次选举则有所不同。2011年11月23日投票时，福岛县选民共计1642363人，投票率不到47.51%，是1947年县议会选举以来最低的一次（参见表1）。而福岛市的投票率

更低于全县，仅达到 44.48%。至于民主党在福岛县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则更是暴跌，从前一次的 23.1% 跌落至本次选举的 16.3%。与之相对应，自民党的得票率从前一次的 40.9% 增长至 46.7%。

（三）民主党政府在福岛选举后亡羊补牢

福岛县议会补选结束了，而福岛县政治地图的改变仍有扩散的可能。民主党在灾区地方议会补选中的成败，宛如一只见微知著的“政治晴雨表”，显示出公众对执政的民主党及其野田政府应对核泄漏事故的评判，并随着时间推移把这种评判广泛传播开来。

2012 年 3 月 11 日，日本迎来大地震一周年祭，上至天皇下到国民无不在痛悼死难者的同时，社会舆论又一次集中火力批评民主党的核电战略。一周年祭当天，《朝日新闻》编委会委员星浩发表了纪念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的署名文章《核泄漏事故的教训》，指责政府在核泄漏事故中应对不利。而民主党内部要求顺应民意的意见也开始增多，为此野田政府开始作出“安全至上、限制发展核电”的能源战略调整。文部科学省也公布了新的教科书的审定结果，不否定部分教科书对政府一直强调的安全性表示质疑。^① 这一切对于福岛县议会选举显然为时晚矣，但对民主党执政来讲仍然有亡羊补牢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杨伯江：日本的对外战略走势

因篇幅有限，笔者仅从野田内阁的外交安全政策入手，对日本的对外战略走势做初步探讨。

（一）外交政策

野田内阁在国内政治上面对重重压力，执政前景充满变数，但是，在对外政策上的进取态势及所获成果，却令人刮目相看。野田执政以来，日本频繁出现在世界特别是亚太舞台的聚光灯下。与几任前辈相

^① 围绕核电站及地震灾害，新教科书中出现了诸如“对地震国日本的核电安全性提出了质疑”（《地理 A》）、“也对以往我们依赖于核电站的生活方式提出了疑问”（《现代社会》）的表述，家庭课教科书中编入了食品放射性物质含量基准值，地理教科书则提及海啸导致的遇难人数。

比，野田的外交、安全政策更为务实、平衡而强有力。他虽然没有像小泉那样高调追随美国，没有像安倍那样要“摆脱战后政治”，没有像麻生那样搞“自由与繁荣之弧”，更没有像鸠山那样呼吁建立东亚共同体，但是在上述几个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野田内阁通过表态参加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恢复被菅内阁推迟的2014年解决普天间基地问题最后期限，大幅修补了日美政治互信；通过与菲律宾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联合东南亚南海声索国推动建立多边谈判框架以及与缅甸商签投资保护协定，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对东南亚特别是中国近邻国的影响力。野田把韩国作为首个正式出访的国家，对签署中日韩三边自由贸易协定（FTA）继续表现出浓厚兴趣，并试图借加入TPP谈判刺激这一进程前行。在安全、经济上强化对印关系后，2012年，野田内阁将把政权交接后的俄罗斯、朝鲜作为重点关注对象，争取改善关系、启动合作，进一步从地缘政治、大国多边博弈多个角度增加手中的战略筹码。

野田内阁的一系列动作首先反映了国内短期政治因素的作用。他迫切需要用对外进取赢得党内和民众支持，需要借转移舆论焦点、反衬前任的“无谋”与“失政”，达到“以外补内”的效果。但从长线观察，野田内阁的举动则映衬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某些基本走势：（1）在手段上，越来越倾向于借助“战略性外交”、积极进取的安全政策弥补经济低迷造成的政治影响力衰减。从自民党政权后期，该迹象即已出现，历经民主党两届内阁——鸠山内阁的“普天间之败”与菅内阁的“外交失语”，到野田内阁有集大成之势。（2）目标是在国际权力重组过程中，维持并争取增进政治经济权益，核心是增强战略主体性和决策自主性。野田内阁的对美、对华、对新兴经济体政策，就是典型例证。（3）政策的综合性、兼容性、谋略性增强，最大限度地预设战略空间，增加回旋余地。野田内阁对几个重点方面的政策，都同时兼顾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双边关系与多边博弈、地区框架与全球格局等多个角度。

（二）安全政策

1994年日本先驱新党党魁曾出版《小而闪光的日本》，与“新保”代表人物提出的“正常国家论”针锋相对，反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而要做“小而闪光”的特殊国家——军事小国，更注重解决环境问题

与保护社会弱者。近 20 年，从国土、资源、地缘等自然禀赋及战略文化、劳动力人口占比走势等基本要件看，日本各项指标的体量缩水似乎无可避免，从历史角度看也是在回归常态。同时，日本也在“闪光”，不过对闪光点的选择却与宫泽喜一、武村正义等传统保守派、温和保守派的主张大异其趣。

在日本对外战略中，安全、防卫政策要素在上升，资源投入持续加大。从国际标准看，日本显然不是穷兵黩武的国家，军事手段并非其解决对外争端的首选。但与过去相比，日本明显早已不再是那个“外交就是经济外交”的国家，而正在快速走向“正常国家”，对外姿态也更加强硬。然而，鉴于财政压力，防卫预算已连年负增长，日本加大对安全军事领域的投入也主要是通过政治松绑与政策设计来实现。2010 年底菅内阁修订《防卫计划大纲》，从战略到部署都有重要调整，原计划在 2011 年全面落实，却被东日本大地震打断了进程。但灾后财政愈加拮据的现状，反而刺激了民主党少壮派安保团队加紧推动放宽武器出口禁令。2011 年末，野田内阁决定大幅放宽禁令，参与武器研发和生产的国际合作，直接目的在于缓解预算压力、扶助军工产业及提升装备水平。但是，从深层和长远看，此举势必推动日本安全政策进一步调整，对地区安全形势构成多重复杂影响。

美国政策因素对日本安全战略转型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要“重返亚洲”，将“防止地区大国或国家集团崛起、挑战美国的霸权和主导权”重置首位，但单独、直接发挥地区制衡作用不仅力有不逮，而且不够“巧”。为此，从 2010 年早春国防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开始，历次官方文件无不特别强调日本等“重要盟友”的作用。东日本大地震后，美国一方面激励日本“不要在世界舞台上沉寂下去”，一方面通过“朋友作战”行动积极援日救灾，令日本再次认识到关键时刻还是美国能倚靠。美国要“重返亚洲”，但同时又要削减 60 亿美元军费，日本的作用自然“被提高”。在日本要更多发挥国际和地区安全作用这一点上，目前恐怕是战后历史上东京和华盛顿共识度最高的一个时期。

与自民党传统对美政策相比，民主党政权对美更强调主体性、自主性。是选择“日美同盟下的日本战略”，还是主张“日本战略中的日美

同盟”，民主党政权给出的答案是后者。野田内阁对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配合较前任显著加强，背后则是“更主动利用同盟为日本的利益服务、而非单向被美国所用”的深层考量。自民党小泉内阁曾以派兵伊拉克助美反恐换取美国容忍日本干预汇市、压低日元，为恢复经济争取到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乘机通过多项“有事法制”，为日本发挥国际安全军事作用铺路。野田内阁为修复日美同盟殚精竭虑，在停止从伊朗进口石油等事关本国经济增长与安全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对美明确说不，但最终能否与美国达成妥协、成功换取“容忍”，很值得关注。

（三）对华政策

在地缘环境、基本制度、政治文化等各方面，日本都处于世界几大力量板块间的“边际”地位，情况特殊。带着这样的特殊身份，日本在20世纪70、80年代国力强盛之际，可以自认是亚洲面向世界的窗口、沟通亚洲与世界的桥梁。但在经济长期低迷导致国势衰弱的21世纪，这种特殊身份很容易转化为夹缝状态，陷入太平洋两岸之间的“战略洼地”。

此外，日美同盟的结构性变化，也令日本对外战略的内在矛盾上升。在冷战的政治藩篱下，日本安全上的盟主美国兼具其头号经济伙伴的角色，两种身份高度融合。日本对美国也是如此，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最给力的安全盟友。但是，冷战后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使这两种身份严重错位，日本不得不将安全与经济分开考虑，对外战略的两面性也由此增强。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华政策。小泉任内，中日政治关系僵冷，但贸易投资合作却发展迅速，小泉本人公开讲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威胁、是机遇。

野田也认为中国的发展是机遇。日本购买中国国债，既是出于规避贸易风险、增强中日经济纽带的现实考虑，同时更反映了其对美元长期走势和人民币国际化前景的不同预期。日本要维持分工体系优势、保持领先邻国的发展水平，与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日本21世纪的国策，正如大前研一所说，应当是“以中国为顾客”。野田懂经济，对此应有深刻理解。

经济上依赖，安全上对抗、地缘上争夺，日本对华政策的如此两面

性将长期延续下去，并得到加强。这体现了上述时代与国际背景下日本朝野围绕对华关系的主流意见，也是日本现阶段唯一现实的选择。不过，这种内在矛盾性，也会让日本对华政策两面性的效果都大打折扣。安全互信缺失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经济合作，反过来，经济利益的牵绊令日本无法放手“联美制华”。而且，最关键的是，日本积极进取型新安全战略缺少国内财政的支撑。2011 年，日本研究界提出要在冲绳地区对中国搞“非对称性战法”，以“区域性拒止”阻止中国突破第一岛链，即间接反映出日本的“囊中羞涩”。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吕耀东：2012 年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趋向

2012 年初，野田发表内阁成立以来的首次施政演说，强调将为实现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发挥主导性作用，明确了日本将采取主动性、主导性外交的全新姿态。随后，玄叶外相的外交演说表明，日本“将迈向世界开展积极的外交”，证实了 2012 年日本外交政策及对外关系的总体取向。

野田佳彦上台组阁以来，并未将灾后重建作为其外交根本，却以“泥鳅哲学”推行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借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之机，在强化日美同盟这一基轴的过程中，开展价值观外交，借南海问题拉拢东盟各国及印度，抗衡中国，以参与 TPP 谈判调整日本区域合作战略。目前，野田内阁外交理念由模糊逐步清晰，其外交政策突出表现为：以美国战略东移为契机，深化日美同盟关系，构建以日美同盟为主的东亚新安全框架；调整针对中国的亚洲政策，在钓鱼岛及东海问题上主动出击，加大介入南海问题的力度；拟出台“太平洋宪章”，彰显日本主导性外交理念。

(一) 以美国战略东移为契机，深化日美同盟关系，臆想出台“太平洋宪章”

当前，日本的外交方针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并使其不断深化以适应 21 世纪。野田佳彦上台后，充分利用地震救援加大修复、深化日美关系的外交力度，主张“日美同盟对日本的安全和外交而言是最大的财

产”，对行使集体自卫权持积极态度，拟推出亚太格局新构想，将“太平洋宪章”作为日本外交新战略的基本理念。

1. 以震后重建为契机，深化日美同盟关系

日本竭力使日美合作救灾成为深化两国同盟关系的“主要议题”，强调“深化日美同盟对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不可或缺”，表明日美合作对于日本灾后重建的重要性。野田首相特别强调，将以加强日美同盟为己任。野田内阁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开展外交工作。日美双方多次确认将日美同盟作为亚太地区“共同财产”进一步深化。野田首相首次访美就与奥巴马总统达成继续深化日美同盟的共识。对于深化日美同盟关系，野田强调“我们一直认为这是日本外交的核心，而东日本大地震后更坚定了这一信念。”奥巴马也回应说“日美关系至关重要。希望使同盟关系更与时俱进，顺应 21 世纪的要求。”

2. 野田就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寻求妥协，努力修复日美同盟关系

关于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野田多次表示，根据日美协议推进机场搬迁至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的工作，将尽全力谋求冲绳民众的理解。玄叶外相也强调调驻普天间机场的美海军陆战队的机动性和应急性，指出“在靠近东亚地区的冲绳，无论如何都需要海军陆战队”。野田首相曾表示，“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与安全的基轴”，其根基在安全问题，日方愿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共同提高防卫力。这进一步确认了日美关系的重要性。美国方面也明确表示，日美两国 50 多年的同盟关系是保障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础所在，双方要在安全领域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关系。但是，能否彻底解决驻日美军整编计划，涉及日美之间一些深层的历史性矛盾，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两国关系的瓶颈。野田在 2012 年初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表达了全力推进美军普天间机场冲绳县内搬迁计划的决心。因此，深化日美同盟关系将仍然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

3. 野田首相将提出新外交战略“太平洋宪章”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2012 年初，野田首相已经确定将提出名为“太平洋宪章”的新外交战略，构建关于经济合作和解决冲突的全面规则，以确保亚太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区域稳定，并将于 9 月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该战略基于美国战略东移的新动向，通过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以经济和安全两个支点，加强日美对于亚太事务的主导权。值得关注的是，该新战略在安全方面将基于国际法提出一揽子规范，用以处理海上航行自由及和平解决冲突等事务，建立各国之间多个层面的合作关系。野田认为，为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及稳定，必须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之上，建立包括中俄两国的地区合作态势。可见，该战略的目的不仅是让日美共同主导亚太事务，也力图将中国及俄罗斯纳入日美构建的多边机制中。事实上，这已经脱离了鸠山内阁时期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成为民主党政权出台外交、安全领域新政策的指导思想。

（二）迎合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制定针对中国的亚洲政策

野田上台执政以来，迎合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也发生重大战略调整。其外交重点从民主党执政初期重视东北亚地区，发展日中、日韩关系，逐步发展到突出日本与东盟及南亚的国家关系，积极挑起地区安全冲突，营造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

1. 日本分别与菲、越两国达成“战略伙伴关系”，欲以南海问题抗衡中国

2011 年，日菲两国首脑就所谓“加强南海安全合作”达成一致，在遏制中国正当维护海洋权益的《日菲联合声明》中宣称“南海的和平与稳定极为重要”，借所谓南海海上通道安全保障，为在南海遏制中国维护主权权益诉求。两国以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为基础加深了“战略伙伴关系”，将把两国副部长级双边政策磋商升级为战略对话，日本海上保安厅将支援菲律宾沿岸警备队提升能力，以促进两国防卫部门间的交流等等。从发展趋势来看，首先，日菲两国将举行定期海洋问题磋商。日本认为南海对于日方而言是重要的海上通道，应就“有关中国加强东海和南海主权主张的动向”进行日菲政府间定期磋商。双方还确认将推进合作，以确保日本在此海域的航行自由和船只安全。其次，日菲两国力图使“南海问题”多边化、国际化。《日菲联合声明》宣称，“在航行自由、和平解决纷争等方面遵守国际准则将对整个地区有所裨益”，大有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复杂化的企图。再次，日本与越南将继续加强防卫合作。2011 年，日本防卫相一川保夫与越南国防部

长冯光青共同签署了有关加强两国防卫合作与交流的备忘录，涉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多边安全磋商方式等议题。随后，野田首相与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晋勇签署了《日越联合声明》。野田强调，越南是日本的战略伙伴，“双方就推动核能领域和稀土共同开发合作达成了共识”。可以看出，此举旨在通过经济层面的大力援助，拉拢越南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对抗中国。

2. 继续以“南海问题”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

2011年，日本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就“南海问题”沟通，为加强南海合作谋求“共识”。首先，玄叶外相出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盟三国，就南海的安全合作与三国展开所谓的磋商。其次，日本与东盟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首脑会议上通过了《巴厘岛宣言》。该宣言加入促进和深化日本与东盟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内容，强调“连接东盟与日本的海域的和平与稳定对地区繁荣不可或缺”。日本与东盟的“2011至2015年行动计划”提及双方将在海事机构及海岸警备队的训练、信息共享和能力强化等方面开展合作。这表明日本力图通过与东盟的合作意向，形成对中国遏制的战略意图，明确提出日本未来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抗衡的姿态。

3. 日印双边关系升温，展开全方位合作态势

首先，日印两国就经济、安全等领域合作达成一致。日印一致认为有必要在南海地区构筑安全准则，并力图将该问题扩大成为东亚峰会（EAS）的主要议题。其次，日印两国防长就海上联合军演达成协议，日方希望加强与印度的防卫合作，并在2011年底的日美印三国首次工作级协商会上，共同讨论南海的海上安全问题。日印两国防长就2012年举行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的首次联合军演达成协议。两国还计划促进日本陆上、航空自卫队与印度陆空军的对话与合作。2011年底，野田首相出访印度，并与辛格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就进一步扩大海上安全领域的合作达成了共识，还签署了加强“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三）日本对华政策变动，阻碍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深化

野田上台后随即表示将全力构筑日中两国稳定的外交关系。他认为，改善日中双边关系，要加强多层次、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改善两

国国民感情，但在钓鱼岛领土主权及东海海洋权益等问题上坚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1. 将继续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同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制造摩擦

野田佳彦当选首相后表示要进一步深化日中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却没有发展中日关系的实质举措。因 2010 年 9 月钓鱼岛“撞船事件”而处于低潮的中日关系状况并没有改变。近来，日方变本加厉，拟在 2012 年内完成对包括钓鱼岛附属岛屿在内的所谓“离岛”进行命名，并正式标注在地图上。这一行为彻底背离“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的承诺，将直接冲击中日关系的底线。

2. 加强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外交

野田上台后就确认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积极开展价值观外交。玄叶光一郎外相访韩时强调，“两国共同拥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其中就包含所谓共同价值观。随后，玄叶外相出访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东盟三国。据日本共同社称，玄叶此行宣传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加强同亚洲民主国家的合作，以此防范正在崛起的中国。可以说，玄叶外相一系列的东亚出访目的，都以强化日美同盟为背景，力图扩大“在亚太地区结交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战略合作伙伴”。野田首相于 2011 年底访印，也是其价值观外交的延续。他强调，日印“两国拥有共同的普遍价值观，是亚洲两大民主国家，将加强在政治、安全、经济等广泛领域的合作”，构建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预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价值观外交将会持续发酵，成为日本外交行为的常态。

3. 领会盟国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就“南海问题”说三道四，形成共同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东移亚太地区，并力争将东亚峰会作为发展建立亚洲安全和政治机制的平台，对此，日本与菲律宾等国积极响应，从战略上迎合美国。近来，日本政府表现出对南海事态的密切关注，表示将致力于强化国际多边讨论机制。日本和菲律宾希望通过联手美国将南海问题国际化，利用东盟地区论坛（ARF）部长会议讨论南海安全议题，大有将本属双边范畴的“南海问题”纳入多边机制之中，进而实现国际化的图谋。可以预见，2012 年野田首相访美时将发表两国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其内容涉及再次修改 1997 年重修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重点集中于遏制中国的海洋战略。

日本民主党执政以来，对外关系调整并没有偏离日美同盟的外交主轴，只是亚洲外交的内涵变动频繁，而随着美国战略东移，炒热“南海问题”成为当下日本外交新热点。事实上，日本搅乱亚太地区睦邻环境的功利性外交策略，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其对外战略的根本目的。在民主党执政初期的《政权公约》中指出“日本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以构筑自立和共存的友爱精神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力争成为受到国际社会信赖的国家。”日本民主党基于这样的理念，在政权更迭和上台执政伊始，刻意提出有别于自民党联合政权时期的外交方针和政策。民主党确定的对外关系总体目标是：在取得与国际社会利益一致的同时，为保证本国的安全及实现国家主体性而努力实现“外交立国”；在坚持以“和平宪法”为基础的防卫政策的同时，本着现实且富有灵活性的战略目标，确立日本外交的自立性和活力。但是，上述外交战略理念并没有在野田内阁的外交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强化日美同盟、介入“南海问题”和离间周边睦邻关系等等作为，大有背离民主党执政初期外交战略目标的趋向，表现出日本外交政策的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特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林晓光：野田内阁改组与消费税改革

2012年1月13日，上台四个多月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第一次改组内阁，新任命了五名内阁大臣：冈田克也任副首相兼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担当大臣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田中直纪任防卫大臣，平野博文任文部科学大臣，小川敏夫任法务大臣，松原仁任国家公安委员长和绑架问题担当大臣。尽管野田首相对自己主导的这次内阁改组评价甚高，认为是为切实推进行政改革、社会保障和税制一体化改革而构建的最佳、最强的阵容^①，但是面对堆积如山的内政外交难题，野田内阁能否如愿完成以提高消费税率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和行政改革等改革目标，尚属未定之天。

^① 「改造内閣『最善、最強の布陣』＝野田首相」、『時事通信』2012年1月13日。

（一）野田内阁改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野田首相之所以在新年伊始就改组内阁，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自 2011 年 9 月上台以来，野田内阁虽然在外交领域按部就班地完成了既定日程，但在社会保障、经济复苏、灾后复兴等方面却无建树，而且面临着公共债务余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冲破 200%、日元汇率持续高挺、经济恢复缓慢等难题，内阁支持率不断下滑。野田首相决心加大推进以提高消费税率为中心的国内政治经济一体化改革的力度，把这一改革看做“无法逃避的关键挑战”。为此，野田首相对其内阁进行改组，既为开源节流、重建财政，更重要的是强化政府应对社保和税制改革的能力。

野田首相本人是坚决的增税派，在上台组阁时即选择了与其持同样财政政策理念的安住淳出任财务大臣，又恢复了民主党内的“税制调查会”，任命原大藏省出身、曾担任过财务大臣的“老资格”藤井裕久为会长，以便讨论税制改革、增加消费税等问题，压制党内强大的反增税势力。此次改组内阁，野田首相又任命冈田克也出任副首相兼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和行政改革担当大臣，在内阁排名中仅次于首相，意在借助冈田“清廉”的形象、高涨的人气以及推进改革的坚定意志和强力手腕，大力推进以提高消费税率为中心、包括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行政改革在内的国内政治经济一体化改革。而且，冈田曾作为民主党干事长与自民党、公明党就修改民主党的竞选纲领达成一致意见，与在野党政治家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由冈田全面负责改革事宜并进行斡旋，有利于争取在野党占多数的参议院通过提高消费税率相关法案。

（二）消费税改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民主党在 2009 年选举中大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对自民党提出的税制改革，主张维持 5% 的消费税率。但是上台后，受困于财政紧张，民主党政权也不得不改弦更张，要求提高消费税率，结果被认为是言而无信，进而导致了民主党在 2010 年参议院选举中的失败。野田上台后，表示要推进“有执行力的政治”，提出了“迅速处理好核泄漏事故、实施灾后重建、应对经济和财政困难”等三大优先施政目标。实现这些政策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如何开拓财源是最大的难题。

对此，野田的口头禅是“没有财源就没有政策”，认为“光靠削减

支出来拯救日本经济的方法已经走到尽头，今后必须依靠增税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此，他倡导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10%，通过增加税收为灾后重建筹集资金，释放出强烈的增税信号。^① 2012年新年伊始，野田首相更发出宏愿，宣称不惜任何代价，决不放弃包括提高消费税率在内的税制改革，并任命坚定的“增税派”、“政策通”冈田克也为副首相，主持财政、税制、行政和社会保障改革。这标志着野田政权主导的、以提高消费税率为核心的日本财政改革正式拉开大幕。

2012年1月6日，野田内阁和民主党在首相官邸召开“社会保障改革总部”会议，正式敲定了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大纲草案。草案提出，将在2014年4月把消费税率提高至8%，到2015年10月进一步提高至10%。为了能在3月底前向国会提交增税相关法案，野田首相请求在野党展开协商，以便在朝野达成一致后由内阁会议决定改革大纲，并向国会提交法案，力争在本届国会通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解决收入越低者税负增加感越强的消费税倒挂问题，草案提出了建立“个税税额扣除现金补贴”制度，以发放现金补贴的方式弥补低收入者无法享受到的税额扣除部分。此外，草案还提出将“可在经济形势急剧变化时停止增税”的规定写入法案，并建议在增税前削减国会议员人数和公务员薪金等。^② 尽管如此，增税法案能否在本届国会通过，仍然吉凶未卜、前景难测。

首先，民主党内部围绕税制改革问题的争论激烈。民主党在2009年众议院选举竞选纲领中以减税作为政策方针，所以党内的小泽派认为增税违反竞选纲领，是背信于国民，故坚决反对；而民主党政调会长前原诚司却发表演讲，要求国民对增加消费税给予理解。^③ 可见，民主党内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2012年2月16日，民主党干事长奥石东与小泽一郎和鸠山由纪夫共进晚餐，力图说服两人支持增加消费税，但餐后三人的表情僵硬，似乎表明谈话并不融洽，意见仍旧对立。^④

① 野田佳彦「わが政権構想」、『文芸春秋』2011年9月号。

② 「（野田改造内閣）『消費増税』推進の狙い 副総理に岡田氏」、『毎日新聞』2012年1月13日。

③ 「『消費増税、国民に対する背信行為』小沢元代表」、『読売新聞』2012年1月22日。

④ 「消費増税 奥石氏が小沢、鳩山両氏説得も『このままいったら大変になる』と反対」、『産経新聞』2012年2月17日。

在意见协调未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日本内阁会议于 2 月 17 日决定了包括三大支柱（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行政改革）的一体化改革大纲，并准备在 3 月中旬提请国会审议。^① 这种强行通过改革大纲的行为，加上之前起用担任民主党干事长时力主处分小泽的冈田克也主持改革大计似可说明，野田首相将放弃“举党融合”方针，不惜与小泽派展开激烈争论，甚至不顾其反对而全力推进消费税改革。

如果野田首相真的不顾一切坚决推进增税改革，可能使小泽派破釜沉舟、另立山头，引发民主党党内分裂，并最终导致政权丧失。事实上，由于对增加消费税问题持不同意见，2012 年 1 月已有九名民主党议员退党并另组新党，还与铃木宗男的“大地、真民主党”协商组成联合会派，将在国会审议时采取联合行动。^② 这不仅削弱了民主党在国会的力量，而且有可能掀起民主党新一轮的分裂浪潮。^③ 2012 年日本的“政界重组”，也许将自此拉开序幕。

其次，围绕增税问题，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展开博弈。自民党等在野党以民主党违反了 2009 年众议院选举竞选纲领中的减税承诺为由，要求野田内阁提前解散众议院举行大选。至于民主党反复呼吁的朝野协商，自民党总裁谷垣禎一和公明党代表山口那津男均表示，与其进行必定没有结果的协商，不如解散众议院举行选举，问信于民。^④ 面对在野党的强硬态度，民主党也不甘示弱，干事长奥石东表态说，如果不能与在野党进行协商、达成共识，民主党就单独向国会提出有关法案。^⑤ 野田首相则进一步明确表示，如果不能在本届国会通过增加消费税相关法案的话，将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选举。^⑥

最后，虽然野田内阁对增税改革持强硬态度，但日本一些研究机构就增加消费税对国民收入和生活的影晌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所有国民

① 「(税と社会保障) 一体改革の素案大綱、閣議決定 消費増税柱」、『毎日新聞』2012 年 2 月 17 日。

② 「鈴木宗男氏、新党『大地・真民主党』届け出」、『読売新聞』2011 年 12 月 28 日。

③ 「与党か野党か、民主離党者らの新党構想はや混乱」、『読売新聞』2012 年 12 月 30 日。

④ 「増税と野党協議に否定的…自民、公明両代表」、『読売新聞』2012 年 1 月 4 日。

⑤ 「消費増税法案、単独提出も…民主・奥石幹事長」、『読売新聞』2012 年 1 月 4 日。

⑥ 「消費増税法案首相『不成立なら解散』首相経験者に伝える」、『産経新聞』2012 年 1 月 3 日。

都将面临因增税而导致的收入减少、税负增加的问题，尤其是对年收入在500万~1000万日元的工薪阶层或四人组成的基本家庭而言影响最大。如果这种负面影响波及全体国民，而且受打击最严重的又是社会中间阶层的话，大多数国民反对增税也在情理之中。以“日元先生”称号而闻名的原大藏省事务次官员、青山学院大学教授榊原英资也认为，增税从中长期来看有必要，但现在并非最佳时机。^① 这些信息及其反映出的部分国民的利益和舆论倾向，对于积极推进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和行政改革的民主党而言，恐怕不是一个利好消息。

（三）2012年的日本政治：牵一发而动全身

2012年的日本政治，有三大时间节点值得关注，即3月召开国会审议预算案，6月例行国会结束前能否通过增加消费税相关法案，9月民主党党首选举。

本届国会将首先审议2011年度补充预算案和2012年度预算案，随后在野党将以田中防卫大臣的任命责任和普天间基地问题为切入点追究野田首相的责任，并在消费税问题上与执政党决战，4月以后进入审议阶段的国会将成为“消费税国会”。自民党的参议院干事长沟手显正表示，将在4月提出对野田内阁的不信任案。在野党可能通过提出对内阁的不信任案，要求内阁总辞职、解散众议院、提前选举，也可能以合作通过法案为条件，要求野田首相辞职或协商解散议会。不仅如此，民主党大佬小泽也提出了“决胜负之4月”的说法，民主党内的权力博弈将白热化，是否因此引发党内分裂，将成为观察日本政治时必须予以注意的一个焦点问题。如果小泽派另立山头，民主党的分裂将引发日本政界的新一轮重组，自民党也可能出现分裂，各政党分化组合的结果是可能导致多党林立，没有一个国会席位过半数的政党，也可能因此产生联合政权。日本政界的重新洗牌，将使日本政治继续深陷漂流状态，经济复苏困难，社会改革迟滞。因此，民主党的执政伙伴国民新党代表龟井静香在与野田首相会谈时也表示担心，认为强行提出没有国民支持的增税法案，不仅在国会很难通过，也将削弱政权基础，不如推迟到以后再

^① 「消費増税 歳出削減不十分…国民理解は困難」、『産経新聞』2011年12月30日。

说。^① 显然，执政友党对于提高消费税率等改革案能否在国会通过缺乏信心，更担心野田首相一意孤行会连累联合执政的国民新党。

毫无疑问，财政重建和经济振兴，已成为日本政府的两难选择。推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消费；重建财政，则要增加税收。经济不景气导致税收不足，社会保障又需要大量政府支出，源少流多使日本政府只好大量发行国债，致使其公共债务余额高达其经济规模的两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就已经下调了日本的主权信用评级。目前看来，如果不增税，政府财政就无力承担债务重压；如果增税，将抑制国民消费，即无法通过刺激消费来提振经济。因此日本经济界（包括制造业、百货业、零售业、流通业、房地产业）人士，比如经团联会长米仓昌弘就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希望对增税进行牵制。而从政治上看，因菅直人提及增税而导致民主党在参议院选举中失利的殷鉴并不久远，民主党内争论不休，在野党扬言反对，野田内阁在这种情况下不顾选情而强推增税之策，意味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许将决定野田内阁的寿命。

总之，2012 年，对于野田内阁而言，是难题堆积如山、不可能轻松的一年，增加消费税改革、美军普天间机场搬迁、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等政策课题尚在交涉之中；解散众议院、民主党乃至自民党分裂等一系列政局动荡的火种挥之不去，动摇野田政权的大混乱几乎难以避免。^② 但是，改组内阁和高调推进一体化改革似乎表明，“野田号”开始从“安全驾驶”模式换挡为“加力爬坡”模式，力图以强劲动力穿越“增税”难关，避免在泥沼中“熄火”之虞。“减负”也好，“加油”也罢，改装后的“野田号”能否顺利换挡切换到“加力爬坡”模式，能否取得预期的改革业绩，关键取决于能否填平政策与民意之间的巨大鸿沟，能否取得在野党的谅解。如果能较为顺利地推动国会通过 2012 年度预算案和增税法案，野田佳彦有可能连任民主党党首并继续组阁，这也有利于民主党继续执政成为长期政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① 「野田政権、迫る『3つの危機』、『産経新聞』2012 年 1 月 24 日。

② 「勢いを増す『衆院解散』への流れ」、『深層レポート 日本の政治 (266)』、<http://www.fsight.jp/article/11106>。

张季风：野田内阁面临的经济挑战

东日本大地震以后，日本的经济特别是产业实现了出人预料的迅速恢复，短期性供给不足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新上台的野田内阁仍面临各种经济挑战，例如灾后重建、核事故处理、长期电力不足、财政重建、日元急剧升值等，特别是美国、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能引起的世界经济低迷，导致日本经济的不确定性增强。如果处理不当，上述难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酿成大祸，都可能危及野田内阁甚至民主党的政治命运。

不过，这些难题中有长期的，也有短期的，比如核事故处理、财政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等都属于长期性难题，绝非野田内阁一届或数届内阁所能解决的。虽然这些长期性难题对野田内阁执政和日本宏观经济短期运行也有影响，但程度有限。相比较而言，灾后重建应该算是野田内阁目前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但是《复兴基本法》、《赤字国债发行法》等法律已在国会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发行“复兴债”的法律程序已经完成，可以说最大的难关已经渡过。随着第三次和第四次补充预算资金的陆续到位，灾后重建将进入实质性阶段。当然，在重建过程中还可能出现一些具体问题，但不至于影响全局。此外，以提高消费税率为中心的社会保障与税制一体化改革和参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热点，毫无疑问也是野田内阁当前所面临的非常重大、也非常棘手的经济难题，但因前者与日本国内政治、后者与日本外交战略的关联度很高，加上前面几位学者已经进行过阐述，故这里不再赘述，只想强调一点，即从经济层面来说，鉴于日本目前的财政状况，提高消费税率从长期来看有利于日本的国家利益，而且势在必行。受篇幅所限，我只对电力短缺长期化、日元剧烈升值以及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等最棘手的难题做一探讨。

（一）电力短缺长期化的风险

受大地震和海啸的冲击，福岛第一核电站4个机组遭到彻底毁坏，周边12个机组停机，加上灾区的一些火电设施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东京电力公司管内曾经出现了严重的电力紧张局面。不过，通过采取

节电、用电部门自行发电和错峰用电等方式，日本顺利渡过了最严重的电力短缺难关（2011 年 9 月）。

但是，核泄漏所引起的恐核影响仍在持续。人们始料未及的是，不仅是日本新建核电站、提高核电比重的计划彻底落空，就连现有核电站的正常运转也将难以维持。日本开始大规模对核电机组进行检修，截至 2012 年 2 月底，在日本 54 座核电机组中，正常运行的只有两座。在正常情况下，检修合格的核电站在征得当地政府的同意后即可重新启动。虽然目前有两座核电机组已经通过了检修，但是鉴于当地居民和当地政府的阻力，要重新启动并非易事。但是，与前首相菅直人不同，野田首相主张检修合格的核电站可以重启，最近更积极推动关西电力公司所属大饭核电站重启。一旦成功，将产生示范效应、进而带动其他核电站的重启，这将大大缓解甚至消除日本电力短缺的风险。如果不能成功的话，到 2012 年 5 月，日本所有的核电站将全部陷入停机状态。核能发电占日本发电总量的 29%，一旦核电站全部停止运行，日本电力短缺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而核电站能否重启、何时能重启，并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问题，十分复杂。因此，日本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 1 日正式要求全国除冲绳之外的所有地区采取节电措施。而关西地区由于核电站较多，而且目前大量核电站不能正常运转，缺电几乎不可避免，所以关西电力公司早就要求所辖地区的电力用户在 2011 年冬季节电 10%。

电力短缺会对日本社会的生产和生活造成影响，而且缺电一旦长期化，势必会引起电价上涨。东京电力公司最近已提出对企业用电大户提高电价 17% 的要求。^① 据日本政府测算，如果核电站不能如期重启，全国每年需要增加 3 万亿日元的燃料费用；假如用火电替代核电，可能导致电价上涨 20%，具体来说，一个家庭每月（按使用 300 度计算）将多支付 1000 日元，一个中等规模的工厂每月（按使用 25 万度计算）将多支付 75 万日元，一个大型工厂每月（按使用 240 万度计算）将多

^① 東京電力「大口値上げ、政府が圧縮指示へ 算定基準不適切」、『毎日新聞』2012 年 1 月 29 日。

支付 720 万日元。^① 再者，即使用火电或风电等替代核电，也需要 7 ~ 10 年的时间进行准备和建设。长期缺电，将导致企业因生产成本上升而陷入经营困境，必将成为日本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二）日元剧烈升值

日本经济近年来的起伏表现使得日元汇率剧烈波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元呈升值趋势。特别是大地震发生后，日元曾一度升值至 1 美元兑 79 日元，在日本政府和七国联合干预下，日元汇率恢复相对稳定，基本保持在 80 ~ 82 日元之间。7 月中旬，受美国债务危机的影响，美元大幅度贬值，日元再次升值至 76 日元，并进入新的高峰期。此后日本政府分别在 8 月 4 日和 10 月 31 日单独进行市场干预，但效果有限，目前日元汇率仍维持在 1 美元兑 82 日元左右的高位。^② 日元不仅对美元升值，对欧元也急剧升值，已从 2011 年 11 月初的 1 欧元兑 120 日元升至 12 月底的 96 日元。由于这次日元升值主要是由美元和欧元贬值造成的，所以如果美国和欧洲债务危机得不到解决，美欧经济不能尽快复苏，美元、欧元持续贬值，日元升值局面就难以逆转。虽然日本政府一再表示还可能随时出台干预政策，并设立了总额为 1000 亿美元的日元升值对策基金，但这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尚难下结论。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有利有弊。日元升值改善了日本的贸易条件，对日本进口海外资源、能源、货物以及日本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和海外企业并购、居民到海外旅游等十分有利。但是，短期内日元升值对日本的出口打击沉重。这是因为日元升值将使日本的出口价格上涨，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下降。日本内阁府 2010 年度的抽样调查表明，当日元汇率超过 1 美元兑 83 日元的水平时，日本几乎所有行业的出口企业都会出现经营困难。^③ 常态化的日元升值，已使日本的出口陷入低迷状

① エネルギー・環境会議「当面のエネルギー需給安定策—エネルギー構造改革の先行実施—」、2011 年 7 月 29 日、<http://www.npu.go.jp/policy/policy09/pdf/20110908/20110908.pdf>。

②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从名义汇率上看，日元升值很高，但考虑到日本物价一直处于负增长，而美国物价一直处于正增长，可以认为日元兑美元的实效汇率水平比 1995 年还要低。

③ 内閣府『平成 22 年度企業行動に関するアンケート調査報告書』、2011 年、http://www.esri.cao.go.jp/jp/stat/ank/h22ank/h22ank_houkoku.pdf。

态，加之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欧美市场疲软，今后日本的出口将更加难行。

另外，在日元升值的压力下，加上电力长期短缺，日本企业不得不走出国门，以规避汇率风险和国内经营成本上升带来的风险。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11 年 5 月的一份调查，约有 69% 的日本企业表示可能加速向海外转移。^① 这将使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程度加剧，导致地方经济进一步衰退，失业率上升，从经济结构上削弱日本的竞争力。

（三）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

日本是一个资源和能源稀缺的国家，依靠加工贸易实现了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萧条，尽管外贸依存度不高，但由于人口急剧老龄化，劳动人口与总人口持续减少，国内市场趋于饱和，个人消费和设备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所以出口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出口不仅是经济复苏的起爆剂，也是经济景气的最主要动力。简言之，出口增加则日本经济景气，出口减少则日本经济萧条。

2011 年 7 月以来，受主权债务危机拖累，美国经济陷入低迷状态。而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比美国更严重，继希腊之后，西班牙、葡萄牙陆续出现债务危机，意大利的财务状况也开始告急，整个欧元区的财务状况、经济状况比美国还糟。据此，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国际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相继下调了美国以及欧洲国家的国债信用评级。目前，欧洲各国能否自救、或者能否依靠德国和法国解决问题尚难下结论，世界经济二次触底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欧美经济下滑对日本经济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导致日本出口减少。（1）如前所述，欧美经济的下滑和不确定性使美元和欧元大幅度贬值，可能导致日元升值常态化，降低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使出口减少。（2）若欧美经济不能尽早复苏，可能使其消费市场萎缩。一旦欧美市场大幅萎缩，日本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将受到严重影响。（3）东亚与日本、欧美之间存在着三角贸易关系，即东亚从日本进口高端技术和

^① 経済産業省『ものづくり白書（2010 年度）』、2011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meti.go.jp/report/whitepaper/mono/2010/>。

高端零部件在国内进行组装后再出口到欧美等终端市场。^① 2009年，日本向东亚地区出口元器件材料、零部件等中间产品达2232亿美元，而向东亚出口的最终消费品仅为829亿美元，也就是说日本对东亚的中间产品出口是最终产品的2.7倍。^② 这意味着，如果欧美市场大幅度萎缩，东亚地区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也将减少，这势必会间接影响日本与东亚之间的贸易，即影响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出口。

在日元升值和国际市场疲软的双重打击下，2011年日本的出口与上年相比已减少了2.7%，而且出现了自1980年以来的首次贸易逆差，逆差总额高达2.5万亿日元。如果出口长期持续减少的话，必将对日本整个宏观经济造成重创。

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的景气循环一直按照“出口扩大→生产扩大→设备投资扩大→就业扩大→消费扩大”的路径展开，而经济陷入低潮也往往是从出口减少开始。2008年秋季，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的金融机构并未遭受太大损失，但实体经济却严重受挫。2008年第四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骤然下降13%，整个2008年度下降4.1%，为二战后以来日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最低值。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下滑，就是由日本的主要出口市场——欧美市场萎缩使日本出口急剧减少造成的。显而易见，较之大地震，日元升值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可能给日本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① 参见张季风《挣脱萧条：1990～2006年的日本经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06～307页。

② 経産産業研究所「RIETI-TID2010」、<http://www.rieti-tid.com/>。